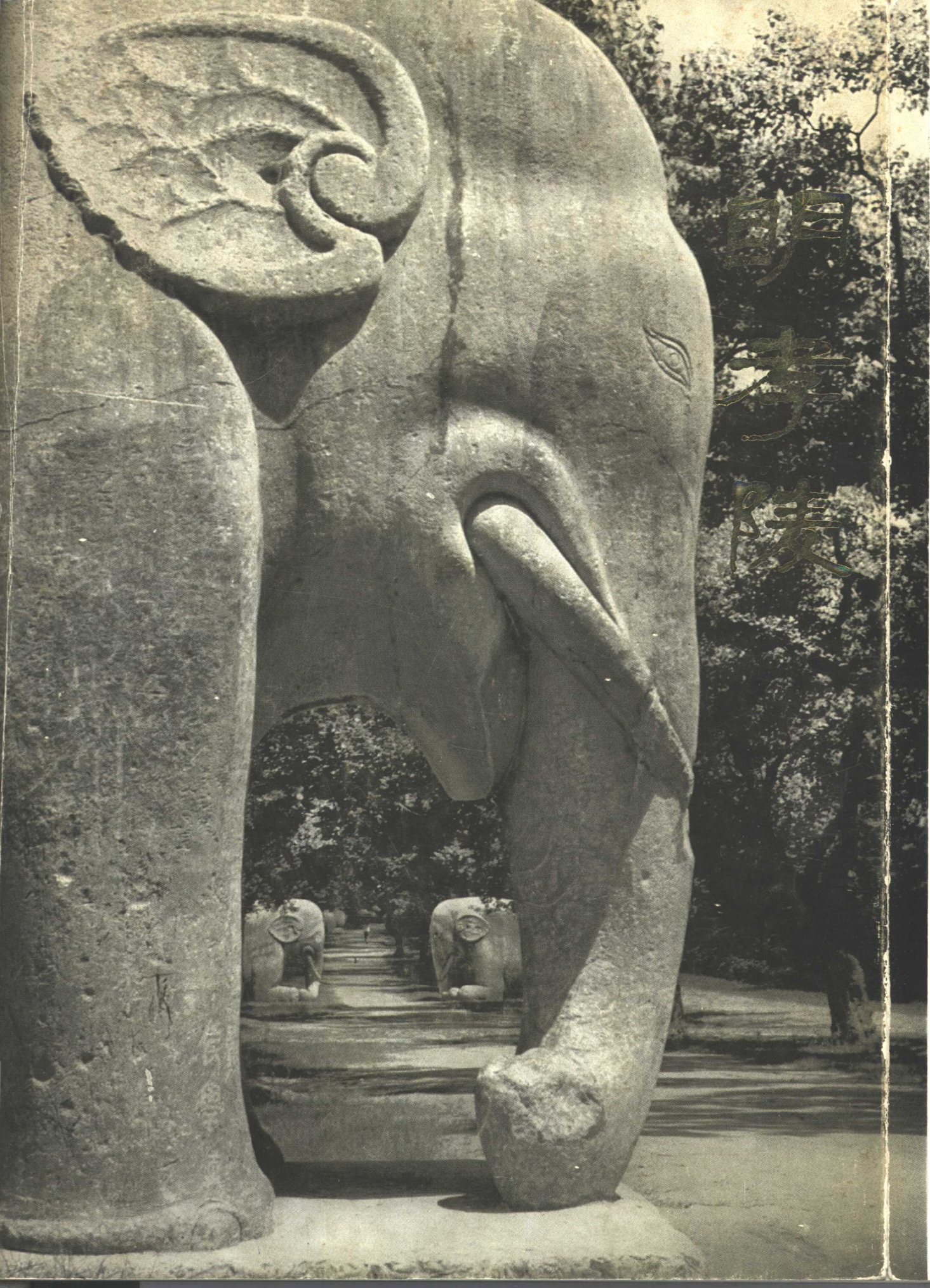


明孝陵



明 孝 陵

南京博物院编

•

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五四大街29号

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198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16开 印张 9

统一书号：7068·878 定价：9.00元

明孝陵

明孝陵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，位于南京市东郊著名的紫金山南麓。

朱元璋（公元1328—1398年），原名重八，后名兴宗，濠州（今安徽凤阳）钟离太平乡人。据朱元璋自撰的《朱氏世德碑》所记，他的祖籍是金陵句容（今江苏句容），祖上原是淘金户，因受不了官府的压榨，在他祖父时，逃到泗州盱眙（今江苏泗洪），日子仍旧过不下去，在他父亲时又迁到了濠州钟离县。朱元璋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农民家庭里。朱元璋在幼年时，当地发生瘟疫，父母和兄长相继病歿，成了孤儿。由于孤苦无依，在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。元至正十二年（公元1352年）朱元璋二十五岁时，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军。后来郭子兴去世，他又成了这支农民军的领袖。至正十六年（公元1356年），他率军攻下江南重镇集庆（即今南京）。至正二十八年（公元1368年）登基称帝，定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，并改都城集庆为应天。同年八月，又攻下了元朝的京城大都（今北京），推翻了元王朝的统治。

洪武十四年（公元1381年），朱元璋五十四岁时开始营建陵墓。第二年葬入皇后马氏，大约因马皇后的谥号是“孝慈”的缘故，被命名为“孝陵”^①。洪武十六年（公元1383年）孝陵落成，前后用了两年时间。参加建陵的工匠，总数有好几万人。朱元璋七十一岁病逝，葬于孝陵。当时殉葬的嫔妃和宫人多达数十人。

关于孝陵地点的选定，张岱《梦忆》记云：“钟山（即紫金山）上有云气，浮浮冉冉，红紫间之，人言王气，龙藏蛻焉。明太祖与刘诚意（刘基）、徐中山（徐达）、汤东甌（汤和）定寝穴，各志其处藏袖中，三人合，穴遂定。”这说明对于孝陵的陵址，朱元璋是经过一番选择的。

孝陵是我国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几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，自最前面的下马坊至后部的方城，纵深达二·六二公里。围绕孝陵的红墙，据《康熙江宁府志》的记载，周长二二·五公里，而当时都城应天的城墙，总长为三三·四公里，孝陵的墙垣相当于京城城墙长度的三分之二，可见规模的庞大。但是经历几百年的岁月，特别是清代初年和后来清统治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两次战火，孝陵的建筑遭到严重的破坏。

孝陵的平面布局，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：前自下马坊迄棂星门，是作为导引的神道设施；后是陵墓的主体陵寝建筑。

下马坊是孝陵的起点^②。下马坊为一间两柱“冲天”式石造牌坊，面阔四·九四米、

高七·八五米，柱断面作抹角方形，两柱前、后及外侧，均抱以碑石，柱端饰以云板云罐，内侧雕出梓框，镶入大额坊，额上横刻“诸司官员下马”楷书六个大字。下马坊东三十六米处，是嘉靖十年（公元1531年）改鍾山为神烈山而竖立的“神烈山”碑。碑通高四米，碑额篆刻“圣旨”两字，碑上款刻“嘉靖十年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”，下款刻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石”。这里原有方形碑亭，已倒塌，尚存带颤复斗形石柱础四个，柱础高九七厘米、宽一·一〇米，柱础的侧面浮雕有石榴、牡丹、山茶、金菊等图案。从神烈山碑东去十七米，为崇祯十四年（公元1641年）立的“禁约碑”，此碑为卧碑，通高三·四六米。碑首雕二龙攫珠，碑面镌刻禁止损坏陵墓及谒陵条款（碑文见附录二），下为须弥座台基及两层条石基座。禁约碑以东为朱元璋死后设置的、保卫孝陵的卫所——孝陵卫，这里曾驻有兵卒五千多人，现在已无遗迹可寻，仅存地名而已。

由下马坊西北行约七五五米，是大金门。大金门是孝陵陵园的大门，南向，面阔二六·六六米、进深八·〇九米，有券门三洞，中门较高，两侧门较低。大金门的下部为石造须弥座，束腰部分浅雕碗花，须弥座以上为砖砌。从须弥座至挑檐石下皮，高四·九一米，屋面已毁，一九六四年曾对屋顶进行整理，据结构判断为重檐歇山顶，并采集有黄色琉璃瓦及绿色琉璃椽子等实物，腰檐下不施斗拱，代以石制挑檐。当年大金门是朱红双扉，琉璃瓦，庄严华丽。大金门东西两侧原接有陵园的红墙，现在已被湮没，仅能看到连接的痕迹。

从大金门正北去七〇米，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永乐十一年（公元1413年）所立的“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”。碑高六·七米。龟趺座高二·〇八米。碑文为朱棣所制，记朱元璋一生事迹，楷书阴刻，长达二千七百四十六字（碑文见附录一），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块。碑亭平面作正方形，面阔、进深均为二六·八六米，下部为石造须弥座，束腰部分浅刻碗花，上部砖砌。四面各开券门一洞，从须弥座至现存的四壁顶部残高八·八四米。亭顶部已毁，内望通天，俗称“四方城”，其结构、形式已无法考察，以北京长陵碑亭为例，或为重檐歇山式。碑亭南面正门外，有石阶一块，半掩土中，长二米、宽一·五九米，其上浮雕云龙狮球，相当工细。石阶前现存石栏干一段，龙凤柱头，高一·九〇米、宽六·九七米。

从碑亭西北行，过御河桥，约一〇〇米，神道石刻开始。神道石刻分两段，一段西北向，长六一·八米，地势略有起伏，布置石兽六种，十二对，二十四件。六种石兽依次为狮、獬豸、骆驼、象、麒麟、马。每种两对，造型均为一对佇立，一对蹲坐。石兽作相向的一坐一立相间排列，两兽间相向的距离由四·八八至六·九〇米不等，每对石兽之间的间隔为二九·八〇至五二·五〇米不等，石兽尽处，神道折向正北。此段神道石刻到棂星门为止，长二五〇米。前为白石望柱一对，次为武将两对，再次为文臣两对。望柱高六·二五米、东西相距五·二〇米，柱与基座断面俱作六棱形，顶端作圆柱形冠，柱

身浮雕云气纹，柱头浮雕云龙纹。两对武将，一对无须，一对有须，各高三·二三——三·二六米，东西相距四·三〇米，身穿介冑，手执金吾，腰佩宝剑。两对文臣，也是一对无须，一对有须，各高三·一八——三·二三米，东西相距四·三〇米，头戴朝冠，手秉朝笏。石人之后十八米即是棂星门。棂星门，南向，偏西二十度。原址现仅存石柱础六个，原来当为三间两垣，面阔一五·七三米。侧面浮雕有花草纹，碑石八块，两侧浮雕云纹。棂星门的外观已难推断。

由棂星门往东北二七五米，折北便是御河桥。御河桥石造，原五孔，现为三孔，桥面栏干后配，桥基和两岸石堤是原物。自御河桥往北到方城宝顶，建筑物按南北中轴线配置，方向不再变更。

御河桥北二〇〇米，是文武方门，进入文武方门，便是孝陵的主体建筑范围了。文武方门原为五门，正门三洞，黄瓦单檐，东西两侧各距二七·三〇米，有侧门各一，俱毁，尚有遗迹可寻。现在的正门只存洞门一，上嵌青石门额，宽一·九九米、高一·〇七米，阴刻“明孝陵”三字，边饰云龙纹，大致是清同治以后重修的。门之东西两边接有围墙，向北作长方形延伸，把后面的孝陵殿（即享殿）围绕在内。

门外东侧红墙下和门后碑殿的东墙下，各有“特别告示”碑一通，高一·〇五米，用日、德、意、英、法、俄六国文字刊刻保护孝陵的告示，这是清宣统元年（公元1909年），两江洋务总局道台和江宁府知府会衔竖立的。

进文武方门为广地，东西宽一四四米，南北深四一·四五米。广地内原来布置有御厨两所，其确切位置已不可考。广地东西各有井一口，西井完好，井栏平面作六边形，井亭已废，亭柱础尚在，亭平面亦作六边形。东井已废。右有具服殿，东向，其位置也不可考。左有宰牲亭，西向，其遗址尚可辨认。在东井附近，曾出土白石槽一件，长三·一〇米，石槽由两块拼成，可能是文献所说的“雀池”^③。在东井遗址上，还存在少量青花瓷片，多数为明末清初产品。

文武方门之北三四·一五米，原是孝陵殿殿前的中门，即孝陵门，现俱毁，仅存东西广四〇·一〇米、南北宽一四·六〇米的须弥座台基，台基前有踏垛一道，后有三道，台基两侧原来当有墙垣向东西伸出，现今还有痕迹可见。台基上原有面阔二二·三〇米的门基，现于此建立了碑殿。殿内陈列石碑五通：正中一块是康熙三十八年（公元1699年）爱新觉罗·玄烨所立。高三·八五米、上刻“治隆唐宋”四个大字，上方刻“康熙岁次己卯四月望日敬书”十二个小字。东面一块高二·七一米、西面一块高三·六三米，两碑都为行书阴文，刻爱新觉罗·弘历题诗，边饰云龙纹。殿内靠后两边是两块卧碑，东面一块高一·四八米，正面刻康熙二十三年（公元1684年）玄烨谒陵纪事，背面刻两江总督王新命等题名。西面一块高一·四五米，正面刻玄烨在康熙三十八年谒陵情形，背面有两江总督陶岱等的题名。

碑殿之后，复为广地，其间原有神帛炉两个，左右庑三十间。这些建筑也都已毁，但柱础尚存。享殿西侧空地上，一九六五年夏初清理出柱础四十二个，其中六个柱础的位置未曾变动，应是原来西侧廊庑的遗物。广地纵深五五米，其北即是孝陵殿。由文武方门至孝陵殿，中央有御道宽一·五九米，悉以巨石铺砌。

孝陵殿是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，规模宏大，现在可以看到的原来三层石造须弥座台基，三层台基通高三·〇三米，台基的四角上，还遗留有石雕的螭首，台基前后，各出踏垛三道，中央踏垛居中置陛，现今还遗留浮雕云龙山水的大陛石六块。在三层须弥座上有殿基，殿中原供奉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神主，清咸丰三年（公元1853年）毁于兵火。现在大殿殿基上还保存着大石础五十六个，据此可推断当年孝陵殿，是面阔九间、进深五间的巨大建筑。现有的建筑，是清同治四年（公元1865年）和十二年（公元1873年），两次重新修建的^④，规模比原来的小得多，殿中壁上挂有朱元璋纸本画像（见插图），高二·四八米、宽一·五〇米，大约是清末修建享殿时挂上的。殿基东西短墙也是后来重修的，把原来孝陵殿基和石栏干，都砌到墙外面去了。享殿正北二〇·四〇米，有过门一道，门东西有墙向北与方城两侧的八字墙相接，可能还是原来的建制。门北一三三·三〇米，是大石桥。

大石桥，单孔，南北长五七·五〇米，两侧置石栏。桥北约七·八〇米，即达方城。从文武方门到方城，共长三七五米。

方城是宝顶前面的一座巨大建筑，外部用大条石建成，正面自须弥座基至墙面顶



端，高一六·二五米。下部须弥座，在束腰部分饰有绶带纹和方胜纹。方城的東西两侧各有八字牆一堵，各高七米、长二〇·六六米，牆下部为两层砖砌须弥座，牆面四角饰有砖雕花纹，这些砖雕可视作明代初年的代表作品。方城正中有券门一洞，高三·八六米。从此入口是圆拱形的纵向隧道，由五十四级石阶构成，隧道两壁底部仍作须弥座结构，向上出隧道为方城与宝顶之间的夹道，宽五·六〇米，其北即宝顶南牆，用条石十三层垒筑，上横刻“此山明太祖之墓”楷书七字，据说这七个字刻于民国初年，是用以回答游人询问的。由东西走道折而南，拾级而上，可登临明楼。

明楼东西广三九·二五米、南北宽一八·四〇米，四周有过道，南面有拱门三洞，东、西、北三面各有拱门一洞。明楼现存砖牆四壁，楼内地面以方砖墁地，楼顶可能是重檐黄瓦，已经在咸丰三年（公元1853年）的战火中化为灰烬了。

方城的后面是宝顶，又称宝城，是一个直径三二五至四〇〇米的圆形大土丘^⑤，周围以砖牆约一公里许，牆以条石作基础，东面一段基础以上砖牆高六·七〇米。宝顶上树木参天，其下即是朱元璋与马皇后埋葬的地方，可能建有和北京定陵类似的整套地宫建筑。整个陵园原来种植松树十万株，畜鹿一千头，到明末清初的时候，就损失净尽了。

孝陵各部分建筑的兴革，根据文献和实地考察，所能知道的如上所述，更详细情况的了解，由于记载特别缺乏的缘故，已很不容易了。《明实录》和《明会典》都很少讲到孝陵的建设。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所列《孝陵纪略》一卷，只存名目，原书不曾得见。顾炎武画的《孝陵图》很有名，卓尔堪在康熙年间游孝陵时，曾经携图对展^⑥，但不知此图是否还在人间。明《金陵梵刹志》中凌大德绘的《孝陵图》因附在灵谷寺一起，过于简略，不能据以对勘各部分建筑的位置和形制。因此，除非发掘孝陵或可有更多的了解。

关于孝陵的建制和布局，《明史》说：“（洪武）四年建祖陵庙。仿唐、宋同堂异室之制，前殿寝殿俱十五楹，东西旁各二，为夹室，如晋王肃所议”^⑦，按照前有神道，后有陵寝，封土起坟的陵墓布局，孝陵基本上是继承了前朝制度；但是，按照神道和陵寝的具体安排与做法来说，孝陵的体制则在前朝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。

首先，孝陵废去了方上、灵台、方垣、上下宫的制度^⑧，新创了方城、明楼和享殿等建筑，改方坟为圆丘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

方上的做法，自周文王陵到汉元帝渭陵，经历一千一百多年，逐渐发展起来的。就是在地面上作方形封堆，并逐层收分夯实，最后成为覆斗状坟堆的一种做法。唐太宗李世民营昭陵，设上下二宫，一直相沿到南宋都没有变化。灵台、方垣、上下宫的制，集中见于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。神道以北是上宫，为陵墓的主体，平面作正方形，周边围以神牆，上宫中央为灵台，乃一方锥形的大夯土台。唐宋制度的下宫，包括棂星

门、殿门、神厨等。上下宫备日常生活用品及祭陵物品，由守陵人等使用。《汉官仪》载：“古不墓祭，秦始皇起寝于墓侧，汉因而不改。诸陵寝皆以晦、望、二十四气、三伏、社、腊及四时上饭。其亲寝所宫人，随鼓漏理被枕，具盥水，陈装具”^⑧。与事生无异。朱元璋併上下宫为一，在他临死之时，还谕示“丧祭遗物，毋用金玉，孝陵山川，因其故，勿改作”^⑨。仿佛对前朝在建造陵寝方面过于铺张和糜费要有所改革，但事实上仍不过是流于形式的官样文章。

在宝顶之前建方城和明楼，与迎敌的丽譙一样，雄伟高崇，可以极目远望，也是孝陵的创新^⑩。石望柱的位置和唐宋以来诸陵不同，不列于石兽之前，而置于石兽与石人之间，也是特例，其含义还不甚清楚。

孝陵的规制，对其后的明代诸陵和清代帝陵的兴建，有着深刻的影响。葬朱元璋高祖、曾祖和祖父衣冠的泗洪明祖陵，它的兴建晚于孝陵五、六年，神道部分取直线约长二五〇余米，仍仿唐宋山陵制度，从最后一对石刻至宝城明楼，约长一四〇余米，与孝陵规制相同，但规模甚小^⑪。北京的明十三陵，各陵的建制与孝陵几乎完全一致，且共同使用一条神道，总长度达七公里。如果把这一组陵寝，有机地联结起来看，应是世界上完整地保存到现在的最宏伟的帝王陵墓建筑^⑫。

其次，孝陵规制的特点，在于人工建设与自然形势的完美结合，而神道部分（从下马坊至棂星门）完全依山势作迴转曲折的布置，这在陵墓建筑中是前所未有的。

孝陵的主体建筑座落在钟山之阳，从御河桥起到宝城止，包括文武方门、中门、孝陵殿、石桥、方城、明楼等，排列在南北中轴线上，庄严、方正、均衡、协调，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的思想要求。但是，作为谒陵的导引部分，即从下马坊起到御河桥止的神道部分，其长度达二公里，约占陵墓全程的四分之三强，却完全是依着地形的高低起伏，山势的迴旋变化，任其自然地进行布置的，确实是一个创新，打破了历代陵墓建筑的传统原则。神道石刻部分依其方向的转折变易，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段落，在每一段落之间都布置了石雕像来控制其空间^⑬，石兽或蹲或立，姿态交替，配以苍山远树，形成一派严肃静穆的气氛，这是孝陵神道在布置上的成功。

对于陵寝建筑来说，从来都要求人工建造与自然景致相结合，但像孝陵这样既备极庄严、又富于结构变化的设计，的确体现了陵墓设计者的匠心。当然，我们这样说的时侯，并不否定孝陵是属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建筑，它的位置的选择，平面的布置，都要受风水方术的观念和君权的威严，以及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等等所支配。所以孝陵的依山势地形的设计布局，还是在于朱元璋要极力体现出他较之前人似乎更加“伟大”的形象。但不管怎样，孝陵在继承历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基本方面的同时，敢于改变旧的格式，特别是神道部分不取统一的南北中轴线，是对传统观念所作的修正。

第三，在建筑艺术方面，孝陵在材料的使用，以及建筑形式和内容的结合等方面，

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

就整个建筑来说，大金门、神功圣德碑亭、孝陵殿、方城、明楼，是孝陵的主要建筑，都建造得坚固结实。为了防备水火的威胁，大金门、神功圣德碑亭、方城都用了石造须弥座做基础，墙身也系巨石或巨砖砌筑，挑檐也为石造，檐椽用琉璃制作。木结构转换成砖石结构使用于建筑上，早在汉唐时期就已出现。但是，明初在南京宫城和陵墓的建造中，使用了须弥座作整个建筑的台基，特别是用砖石起券建造无梁（量）殿一类大型殿堂建筑，这是明代建筑技术上的新创造。孝陵建筑中运用上述方法建造的几座建筑物，都发展了坚固、厚重、庄严、雄伟的传统，而且手法简炼，给人一种朴素、庄重的感觉。至于孝陵殿，则是大量的使用了木材，是一座木结构的高大殿宇，这是与孝陵殿所处的突出地位，以及为了进行富丽堂皇的装饰有关的。

孝陵的神道石刻，无论题材、造型或者雕琢技巧，都具有鲜明的特点。石刻都形体宏大，以立象为例，高三·四七米，长四·二一米，宽二·一六米，按实际体积计算，原材至少重八十吨；白石望柱高六·二五米；而神功圣德碑更是崇闳，通高达八·七八米。这样高大的石刻，耸然列置于神道的两侧，不仅显得伟丽庄严，而且给人一种静谧肃穆的感受。孝陵石刻取材于南京近郊的大连山，神功圣德碑石材采自阳山^⑤，神烈山碑石材选自宜兴，这些石料都要从一、二十公里以外，甚至上百公里远的山中运来，在当时缺乏现代化运输手段的条件下，单单就运输这一项，其工程之鉅已可想见。然而，整个孝陵的巨大工程，却全部是在两年之中完成的，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。在古代的封建国家内，只有最高统治者的皇帝，才能指挥完成这样壮观的事业。因此，皇帝的陵墓也就成为皇权的一种反映，以不加计较地任意浪费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而造成的这种建筑物，很自然地成了体现皇权既至高无上、又漠大无边的标志。神道石刻形体的硕大，正是这一观念的产物。

石刻在雕凿技术和造型方面，与祖陵神道石刻犹存唐宋遗意的风格不同^⑥，写实是总的倾向，而且作风简朴，线条圆润。如象、骆驼、马以及文臣、武将，完全是写实的作品，不尚浮华。象、骆驼及文臣、武将，又以形体高大取胜。麒麟周身鳞甲片片，狮子头部长鬣螺卷，这也是写实的手法，并非故意造作的华饰。但是在局部的处理上，又着意进行刻划和精微雕琢，从而使虚与实、粗略与精微、素朴与华美巧妙地结合，达到寓细于大、于简朴中透出华丽的艺术效果。如石象，造型高大，神态逼真，手法简洁，似乎只求形态的维肖而别无考虑，但是一对耳朵却又给以精雕细刻，使之耳轮鼓起，筋脉突露，既写实又夸张，大大增强了实体感和造型美。又如文臣武将，着重于对不同服饰的刻划，武将全身披挂，威风凛凛，文臣袍笏肃肃，玉佩璀璨，以及袍服上的图案及迴纹等的绣饰纹样，也都雕琢得一丝不苟，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，性格也益为鲜明。再如白石望柱，整体造型高耸屹立，又在柱体六面饰婀娜迴转的云气纹，自

上而下连成一气，格外显得雍容挺拔，而柱表线条也更趋活泼，华丽悦目。整体造型的宏大和局部装饰的精细，是孝陵石刻的突出特点，两者的和谐配合，并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，则是孝陵石刻在雕琢技术上的极大成功。但是，由于过分讲求写实，某些方面又不免陷于板滞，如文臣武将脸部缺乏表情，石马造型不够生动等，这是孝陵石刻在艺术构思方面所显出的不足。

朱元璋由一个贫苦农民变为封建帝王后，也同历代封建帝王一样，为自己修造了规模巨大的陵墓，这种劳民伤财的举动说明了：朱元璋虽然出身卑微，一旦夺得政权，就走上搞君权神授和世袭制度的道路，他虽然一度是农民起义的领袖，但也脱不出皇权主义桎梏。他依靠农民起义，推翻了元王朝，可是当他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以后，却实行了一套与被他推翻的封建王朝所实行的大体相仿的政策，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，从而转化为农民的对立面。这常常是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领袖在取得政权后，自觉或不自觉地所经历的历史道路。斯大林在谈到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拉辛和普加乔夫时说：“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；他们反对地主，可是拥护‘好皇帝’。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。”并且进一步指出：“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由工人领导的时候，才能取得胜利”^⑦。

总的来说，孝陵是属于“地主文化”一类。但是，毛泽东同志早已说过：“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，农民没有文化。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，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，不是别的，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”^⑧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由于孝陵是封建帝王的陵墓，而予以抛弃，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，把它看作为我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的智慧和劳动结晶，而加以妥善的保护和研究。

孝陵在封建时代是警卫森严的，为此立有许多刑罚制度。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是对立的这一根本性的矛盾，纵然立有严厉禁条仍不免遭到种种破坏。几百年来，不断有伐木的、杀鹿的、烧窑的、开凿红土的，等等。孔尚任在清代初年所看到的情形，已是“宝城石坏狐巢大，龙座金销蝠粪多”^⑨。甚至是“易饼市傍王殿瓦，换鱼江上孝陵柴”^⑩。成为人们进行产品交换所取资的场所。民国年间，孝陵更是到处残壁断瓦，杂草丛生，极目荒凉。建国以后，孝陵开始得到相应的管理和保护，绿化了环境，进行了修缮。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公布明孝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封建时代的帝王陵墓明孝陵，今天已成为人民游览的场所，它将以自己拥有的建筑艺术和秀丽景色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注 释

- ① 《明实录·太祖实录》卷一四七，一四页。卷一四八，九页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九月“庚午发引，是晚仍遣醴饌告谢于鍾山之神，以复土故也，命所葬山陵曰孝陵”。终明之世，都称“孝陵”，明亡以后，称“明孝陵”。
- ② 下马坊，大约于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年）造。当时令：车马过陵，及守陵官民入陵者，百步外下马，违者以大不敬论。见《明史》卷六〇。
- ③ 顾炎武：《昌平山水记》卷上：“（具服殿）垣南有白石槽五，方而长，名曰雀池，贮水以饮雀”。刘敦桢：《明长陵》载《营造学社汇刊》第四卷第二期五一页。
- ④ 享殿，一作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刘坤一建，不知孰是。
- ⑤ 《明史》卷六〇：“凡山陵规制，有宝城，长陵最大，径一百一丈八尺”。合三〇五米，较此为小。
- ⑥ 卓尔堪：《灵谷寺游稿》《谒神烈山陵》诗中有“图絜鹰扬笔最详”之句，自注云：“携顾宁人《孝陵图》对展，宁人自号鹰扬弟子。”
- ⑦ 《明史》卷五八《礼·山陵》。
- ⑧ 刘敦桢：《明长陵》，《营造学社汇刊》第四卷第二期第五八页。
- ⑨ 《后汉书》卷二《明帝记》注。又《日知录》卷一五《墓祭》。
- ⑩ 《明史》卷三《太祖本记》。
- ⑪ 同⑧第五七——五八页。
- ⑫ 张正祥：《明祖陵》，《考古》一九六三年八期。
- ⑬ 伊东忠太：《支那建筑装饰》第一卷九五、一〇九页。英文述要第九四页。东方文化学院，一九四一年。
- ⑭ 建筑科学研究院：《中国建筑简史》第一册第二一〇页。中国工业出版社，一九六一年。
- ⑮ 阳山在南京东南约二〇公里，当地现尚存有明成祖朱棣为建孝陵神功圣德碑而开凿的碑材三通：一碑座，俗称“烂石碑”，长二六·五米，宽一六米，厚一三米；二碑额，作椭圆形，长二〇米，宽一〇·七米，厚九·七米；三碑身，长四二米，宽一一·八米，厚四米。这些碑材凿于永乐三年前。见胡广：《游阳山记》，载《明孝陵志》第九四——九六页。
- ⑯ 同⑫。
- ⑰ 《和德国作家艾米尔·路德维希的谈话》，《斯大林全集》第一三卷第一〇〇页。
- ⑱ 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合订本）第四一页。
- ⑲ 《拜明孝陵》，载《明孝陵志》。
- ⑳ 吴伟业：《秣陵口号》，载《明孝陵志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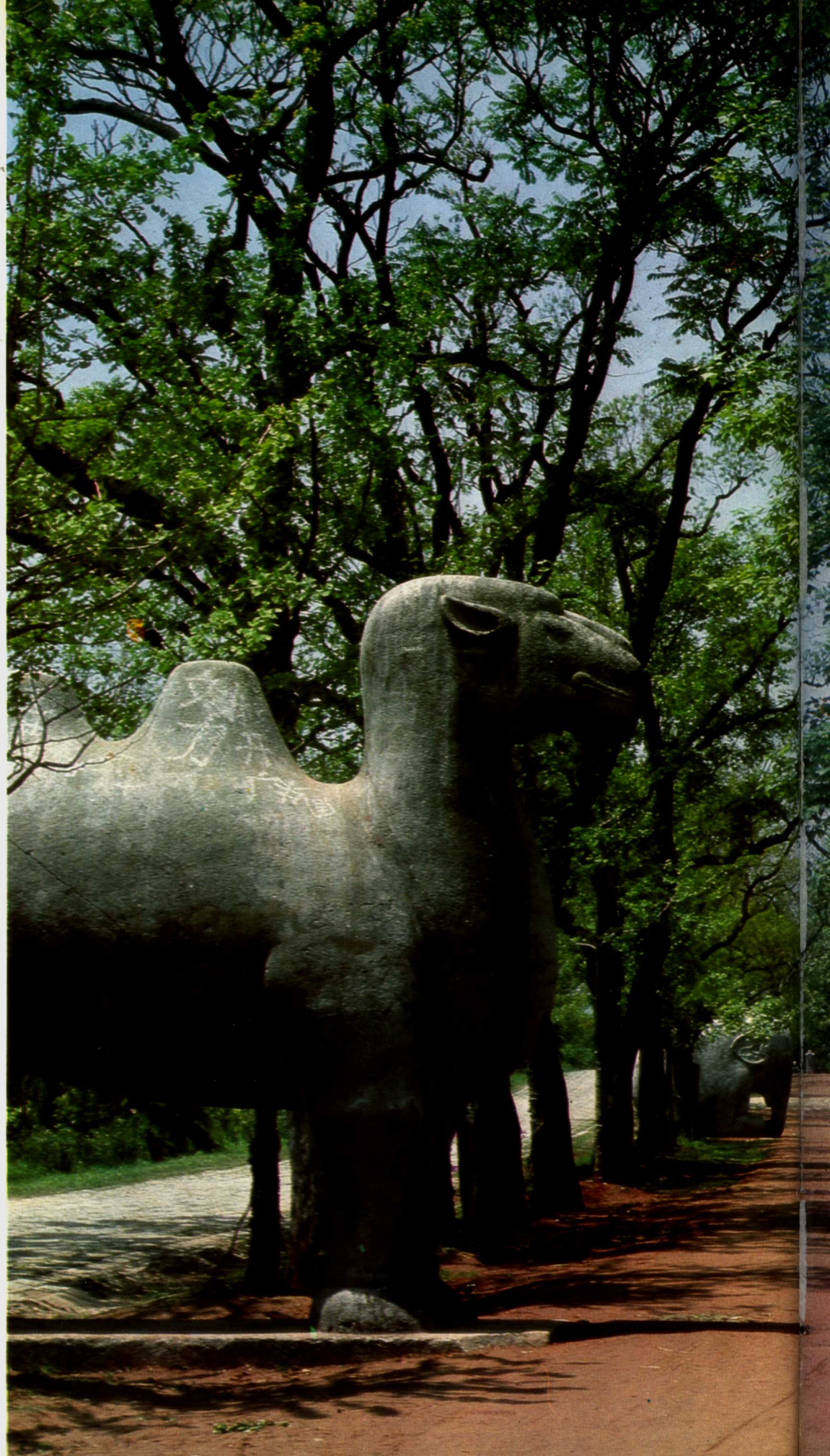
一 孝陵陵门



二 大金门

三 獅 豸





四 骆驼

